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国际政治

美俄在叙利亚由“暗斗”转向“明争”

□ 田文林



9月初以来，有关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的消息引发世界舆论聚焦。先是以色列和土耳其媒体称俄罗斯开始向大马士革派遣战斗机和军事人员；随后英美媒体也声称，俄罗斯已向叙利亚派遣航空分遣队。9月8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法新社均称，数架俄罗斯安-124重型运输机飞抵拉塔基亚附近机场。9月9号，路透社称，俄已向叙利亚塔尔图斯派遣两艘坦克登陆舰，并部署少量海军步战人员。路透社还称，俄罗斯将向叙提供“铠甲”弹炮合一防空系统。9月13日，法新社报道称，俄正在拉塔基亚建设简易机场，跑道足以起降大型飞机。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大方承认。“一石激起千层浪”，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引发美国强烈反应，由此使中东博弈正在进入“美俄时刻”。

俄为何加大军事介入叙利亚

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一直是个“公开的秘密”。巴沙尔政府能够在内外交困的内战中支撑至今，内因主要是叙利亚政府军忠心耿耿，没有出现大规模哗变或溃败，外因就是伊朗和俄罗斯等外部国家鼎力援助，这些援助就包括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问题在于，过去相当长时期，俄罗斯在对叙军事介入问题上表现低调，甚至在8月初还计划撤离常驻叙利亚的俄公民。为何现在却增强在叙的军事存在，甚至普京还公开承认这点呢？说到底，是形势发展使然。

首先，当前巴沙尔政府处境危急，亟需外部援手。经过长达四年多的血腥内战，叙利亚政府军疲态日显，尤其是兵源不足问题日趋凸显。据统计，自2011年3月冲突爆发的叙利亚内战，已造成政府军8万多人丧生。由于伤亡惨重，连忠于政府的叙利亚人也不愿服兵役。据说有7万叙利亚人逃脱兵役。巴沙尔所属的阿拉维派在叙利亚总人口中只有15%左右，因此兵员紧张问题日趋凸显。2015年7月28日，巴沙尔总统首次公开承认，因阵亡、变节和逃避服兵役等情况，曾拥有近30万军力的叙利亚政府军规模减少近半，并坦承“军队感到疲乏”，“其他什么都有，但就是缺人”。因军力不足，叙政府军只能收缩战线，使“伊斯兰国”轻易夺下巴尔米拉，亲政府部队还退出伊德利卜省。据报道，叙利亚政府控制的领土面积不足25%。如果没有外部强援，巴沙尔政府很难长久支撑下去。

巴沙尔政府续存对俄罗斯至关重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为数不多的忠实盟友，塔尔图斯港还是俄罗斯在海外的唯一军港，巴沙尔垮台将使俄罗斯在中东失去重要的立足点；从地区反恐看，巴沙尔政府是目前遏制“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向北高加索地区扩张的重要屏障。如果巴沙尔政府垮台，叙利亚很可能完全被极端恐怖势力占据，并将直接威胁俄罗斯南翼的安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高调示强，宣布将扩大对叙利亚军事介入。

其次，欧洲难民潮引发的舆论变化，为俄罗斯强行介入叙利亚提供契机。2015年以来，欧洲正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目前已有数十万难民涌入欧洲，令欧盟国家焦头烂额、疲于应对。这些难民绝大部分来自战乱不断的西亚北非地区，其中80%难民来自内战犹酣的叙利亚。连年内战使叙利亚近半数国民流离失所，400万人流亡海外。欧洲国家要想遏制难民潮的势头，必须正本清源，设法结束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内部战乱。而这些国家当初陷入战乱，与美欧此前推行的“政权更替”政策直接相关。当年正是英法主导发动利比亚战争，以及在叙利亚策动政权更替，才使这些国家陷入战乱，制造出大量难民。普京9月4日称，难民潮是欧洲国家在中东和北非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对美国亦步亦趋”。欧洲国家开始重新反思对叙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承认并加大军事介入叙利亚，实际是适时引导叙利亚的政局走向，显示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发言权和影响力。

再次，“伊斯兰国”对俄罗斯威胁增大。2014年兴起的“伊斯兰国”非常敌视俄罗斯，该组织因不满普京支持巴沙尔政府，声称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一样，是“伊斯兰国”的敌人，曾扬言要打到俄罗斯，并扬言解放车臣和整个高加索地区。此后，该组织曾出资7000万美元，在中亚开辟新战场。而俄罗斯是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伊斯兰人数仅次于东正教，俄罗斯穆斯林超过2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5%，其中不乏“伊斯兰国”的同情支持者。据俄罗斯专家称，IS组织中有1000多名俄罗斯人。对俄本土安全构成一定威胁。但俄罗斯2014年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打击“伊斯兰国”。目前，随着乌克兰危机局部缓解，俄罗斯的安全关注重点逐渐转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出工不出力”，“伊斯兰国”在2015年持续壮大，其活动范围遍及西亚北非各个国家，极端思想继续向外渗透。在此背景下，俄需要将目光转向中东，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本。而军事介入叙利亚、扶植巴沙尔政府就是重要步骤。

美为何反应强烈

面对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的新态势，美国反应强烈。9月8号，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对俄在叙利亚建立军事设施的做法“深感忧虑”。美国还向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希腊施压，拒绝俄飞机飞越其领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俄罗斯的有关行动会进一步恶化叙利亚局势，这些行动会导致更多人员死亡，会令难民潮进一步扩大，甚至会有与在叙利亚作战的反伊斯兰国的美军及盟友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美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反应如此强烈，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近年俄美关系持续紧张，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美国强烈反应。围绕反导、车臣、中亚“颜色革命”、斯诺登事件等问题，美国与俄罗斯已经持续较量多年。尤其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俄矛盾更趋白热化。2014年9月，奥巴马在联大会发言时，将俄罗斯、“伊斯兰国”组织及埃博拉疫情并称为当今世界和平面临的三大威胁。2015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要用制裁及其他手段使俄罗斯承受破坏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代价，并同盟友一道遏制俄罗斯未来可能的胁迫行为。2015年7月1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15年度《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称俄“好用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目的”，“俄方及其代理势力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地区的安全”。美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在任命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会对美国构成存亡威胁的国家，鉴于其拥有核武器，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大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双方关系高度敌对的情况下，美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大军事行动，自然高度警惕，充满戒备。

其次，美国担心俄罗斯与其争夺中东主导权。近年来，美国整体实力日趋下降，中东政策明显失败，奥巴马总统又急于战略东移，因此在中东战略收缩加快。然而，尽管如此，美国实际是想要低成本维护中东统治，而不肯放弃在中东的主导权。而近年来，俄罗斯在中东则明显由守势转向攻势，地区影响力日趋回升。中东乱局为俄罗斯在中东抓牌、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提供了新机遇。近年，俄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乃至沙特等国的关系都在加强。当前俄在叙利亚加大军事介入，某种意义就是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空白、挤压美国影响力的新信号。德国《明镜》周刊称，俄罗斯帮助叙利亚，背后是其新的中东战略。在美国将大选之际，欧洲又陷入叙难民危机之时，俄罗斯出其不意地开始针对美国展开行动。对西方来说，这是要与西方争夺中东秩序。

再次，从国家层面看，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大相径庭。尽管美俄都力主打击“伊斯兰国”，但美国政策优先重点是推翻巴沙尔政府，乃至借“伊斯兰国”来消耗叙利亚政府军的实力，因此对打击“伊斯兰国”出工不出力。俄罗斯则恰恰相反，其一直力保巴沙尔政府，并将巴沙尔政府作为打击“伊斯兰国”重点依靠力量。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罗斯多次呼吁“国际联盟”在联合国主导下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因为叙政府军是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最积极力量。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较量，本质是对巴沙尔政府去留问题的博弈，是按照哪种思路来解决叙利亚危机。而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就是要力挺巴沙尔，使叙利亚危机朝着俄罗斯期待的政策方向演进。这显然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1日公开称，“俄罗斯现在推行的‘加码押注’阿萨德战略是一个巨大错误”。

总之，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是中东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仅为巴沙尔政府继续掌权注入强心剂，还使美俄博弈日趋公开化，双方日趋由“暗斗”转向“明争”。动荡不定的中东乱局又增添一大新变数。

美国大选投票难

□ 游天龙

作为民主党内的领跑者，希拉里经常要面临共和党参选人的围剿，这也迫使她练成了一身以寡击众的绝活。

在德州一所大学的毕业礼上，希拉里对四位共和党对手点名道姓批评：德州前州长佩里“签署歧视少数族裔选民的法案……并为《投票权法案》（遭高院）部分废除而鼓掌”；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缩短了提早投票的时限并签署法案让大学生更难投票”；“杰布·布什则在2000年犯下严重错误，删掉了大量选民”；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否决了一项延长提早投票时限的法案”；并在最后指出“共和党蓄意的，系统性的试图阻止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选民投票”。

希拉里此次对四个政敌的批评和攻击，直指美国选举制度的核心问题：投票难。

美国总统大选每次都进行得热火朝天，每次活动下面看似都是人山人海，每次大选感觉都关乎美国和世界命运一样，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也是水涨船高，可实际上美国大选投票人数却少得可怜：2012年总统大选只有57.5%的合资格选民投票，尽管从2008年到2012年美国多了800万合资格选民。而2014年中期选举投票率只有36.4%，二战以来最低。对比欧洲国家动辄百分之八九十的投票率，美国投票率低得让人都怀疑他们民主程度不够高了——虽然美国最热衷在世界上推广民主。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国“太民主”了，导致民众“民主疲劳”。相比欧洲各国顶多选个政党，选个议员，然后再由党内部任命政府官员的“不民主”做法，美国开放给选举的岗位太多。不仅总统、州长、市长等各级政府首脑可以选，各级议会议员可以选，甚至连治安官、检察官、法官、州务卿、检察长、警察局长、学区委员等各种各样的官员都要“竞选上岗”。据说全世界参与选举的法官没有美国一个州的多，这就是美国选民的苦恼。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选举日选得不好。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选八月八日八点八分这样的黄道吉日，而是因为他们选了一个“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这样的奇葩日子。选这个日子当初是因为建国初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选举再重要也不能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必须选在既不要插秧也不要收获又不是太冷的11月。同时那时候投票站都设在每个郡的郡府所在地，在火车汽车飞机都没有的年代，农民平均要乘马车一天的工夫才能到达投票站，而周末又是安息日和礼拜日，所以最快只能周一出发，因此大选日就选在了周二。但这一传统却和现代高节奏的工业社会格格不入，美国人周二上了一天班都累死了，哪里还有精神去投票站排队。

还有所谓的选民登记制度。这方面美国可谓“独树一帜”，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积极主动为选民注册的国家。在欧洲，政府要么“贴心”地为选民在申办身份证和参与人口普查的时候提供自动登记服务，要么就“粗暴”地立法规定“强制投票”。而美国各级政府在选民登记事务上非常消极，等到选举的时候查登记状况却很积极，没有登记的人统统没有投票资格。不过这个制度最初就是“打压选举”的制度创新，目的就是阻挠南部的黑人和北部的新移民参与选举。

美国两党也是这一局面的始作俑者之一。为了能让在任的政客更长久地待在职位上，每十年一次的选区重划都成了科学和艺术的结晶，结果大多数选区都出现某一党独大的现象，以至于在任官员经常甚至连个走过场的竞争对手都没有。这种连差额选举都谈不上的选举自然无法激起选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投不投票反正都是他。最后甚至出现美国人口最多选区最多的加州在21世纪前十年仅仅一位议员败选的夸张现象。

而金钱把选举变了味之后，选举就不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游戏了。草根人物想在最基层的选举中出头通常面临巨大困难，这里面最困难的就是钱。当你还在挨个敲门求选票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已经买下电视台电台几十个时段滚动轰炸家家户户了。这一方面阻挠了普通人从政之路；另一方面让普通人对选举产生愤世嫉俗的看法，认为选举就是金钱的游戏，认为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认为自己的声音没人倾听，然后就不投票了。

美国选举“赢家通吃”的规则也很打击选民的积极性。因为美国采用了选举人团这样的间接选举制，所以会出现普选票和选举人票比例差异很大的扭曲现象，造成扭曲的原因就是“赢家通吃”的规则。一个候选人只要在某个州拿下51%的普选票，就可以拿下该州100%的选举人票。这直接导致在大多数州都成了两党的基本盘，纽约州的共和党再拼这个州也是民主党的，德州的民主党再不甘这个州也是共和党的。如今美国大选已经变成“少数人的游戏”，两党候选人置八成民众于不顾，集中火力围攻所谓的“战场州”，奥巴马在2008年也仅仅跑了14个州而已。

在美国想投票？挺难的。

热点透析

环球瞭望

希腊救助协议推动欧元区机制改革

□ 董一凡

7月13日，希腊政府和欧元区首脑在欧元区特别峰会上通过了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第三轮救助的原则性协议。7月15日和22日，希腊议会又通过了欧元区要求希腊在开启新谈判前做到的改革方案，为接下来希欧双方开启实质性谈判铺平了道路。欧委会副主席莫斯科维奇表示，关于向希腊提供860亿欧元援助的谈判预计将在8月20日达成。

希腊“退欧”危机短期内暂时消退，然而在这次危机背后暴露出的问题，则给欧洲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新课题，即如何进一步完善欧元区的治理机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关于希腊债务危机，很多分析认为其原因既有希腊在自身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以财政借贷支撑福利制度和高消费水平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也有欧元区制度本身的漏洞问题。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

欧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考虑并行，且政治考虑更多的计划。由于历史上德国在两次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严重威胁和破坏，欧洲的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把国力强大的德国在欧洲的权力限制住，因此在冷战结束，东西德统一后，欧洲各国都希望将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武器——马克限制住，而德国也接受了放弃马克换取国家统一的条件，这也成为欧元诞生的初衷，而所谓区内各国贸易、支付的便利性和廉价性则并非欧元区各国最关心的内容。

但统一的欧元随之带来了新问题。由于欧元区各国资源禀赋、发展程度和竞争力水平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本应该在国际贸易中体现，进而体现为汇率高低、币值坚挺与否。然而同样的货币却拉平了各国的汇率差异，激发了此前被货币贬值所抑制的南欧国家购买北欧国家产品的热情，因此大大刺激了南欧国家的消费。而金融危机前欧洲低利率的宽松融资环境也进一步“唆使”南欧民众和政府借贷消费，用廉价资金撑起高福利和高消费水平，然而本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却支撑不起这些高水平消费和福利，日子一久，债务比也就远超欧元区“财政契约”规定60%的“红线”，危机便随时可能爆发。

根据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对“最优货币区”的定义，欧元区在以下方面并未达到“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成员国间经济结构相似并具有高度开放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政治上相互融合、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成员国经济结构上，北欧制造业能力和经济份额远超南欧，南欧竞争力不强，比如希腊主要产业只是旅游、船运、农产品加工等难成支柱的行业。宏观经济政策上看，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完全由欧洲央行掌控，但财政政策、产业发展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方面，成员国又是各自为政，虽然欧盟有固定“财政契约”标准，而且有“欧洲学期”等机制，对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审核、监督并为各国分别制定经济政策建议，然而这些机制并不能直接控制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方面，由于南欧消费北欧的产品多，久而久之通货膨胀上升的比北欧要快，产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北欧商品的出口。因此，欧元区在经济上制度性原罪、靠齐西欧福利消费标准对财政的需求及金融危机前欧元区低借贷成本导致“寅吃卯粮”，一同造就了希腊债务危机。

如何修复

从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直至今日，欧洲政治家们就一直思考如何修复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两条道路。一是继续推进经济联盟，实现欧元区各经济体的均质化。简单说就是拉平南欧和北欧的竞争力差距。然而让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赶上德国难于登天。另外一种道路是联邦化，即在欧盟层面上制定欧元区的财政政策，成立财政联盟，进而实现欧元区内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方式也遭到了很多成员国层面的反对。一方面，财政联邦化意味着欧盟越来越朝着超国家机构的方向发展，将进一步剥离主权国家的主权，而欧洲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起主权国家的概念就刻在了欧洲人的骨子里，欧洲大陆民族、文化的差异也使得各国难以接受国家概念和权力淡化，欧洲概念强化的做法。另一方面，财政联盟将要求德国等北欧国家直接给南欧国家施以财政援助，在金融领域甚至要发行“欧洲债券”取代各国国债，成为欧元区共同的融资工具。这样在财政和金融领域，南欧国家不免占了北欧国家财政实力雄厚，融资信用高、成本低的便宜。使得北欧国家民意上更加愿意接受“德国纳税人的钱救希腊懒汉”的观点，对于这样的一体化举措将会难以得到支持，若要推行很可能落得和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在荷兰、法国等国公投失败，最终胎死腹中的下场。

然而，此次希腊债务危机的“尖峰时刻”似乎提醒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不实现政治联盟的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解决永远是治标不治本，难保希腊的今天就是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明天。因此德、法、欧盟的政治家们已经行动起来，为深化欧元区的治理而造势：6月4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和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共同在英国《卫报》上发表联名社论，认为现在应当统一欧元区的竞争政策和财政政策，建立一系列的欧元区财政部、议会欧元区小组等政治实体，共同建设欧元区经济治理模式。6月2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和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又联名发表“五主席报告”，勾勒出深化欧元区经济治理的要点和路线图。7月20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又呼吁深化欧元区建设，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组成“先锋国家”集团，建设欧元区的政府、预算和议会，法国也将在近期公布具体方案。从欧盟到法德两大国都已经有意去推动欧元区的深化治理，说明了现实紧迫性和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力已经十足。

从历史看，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艰难的，凝结了欧洲政治家的智慧和努力，也是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欧元区的深化治理更是需要各国尤其是北欧国家做出更大牺牲。然而，欧元区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欧盟也会尽全力守护欧元区，不让它倒退甚至解体。因此无论如何艰难，理想的延续和现实的需要都要求欧元的制度建设再进一步。